

向。文章最终落脚于对中国的战略启示，在批判科技右翼所代表的排他性技术民族主义

的同时，也隐含着对一种更具包容性、以人为本的科技全球治理路径的深沉期待。

菅泽华：人工智能时代下全球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中国路径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21世纪以来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与数字技术的迭代，为后发国家实现发展追赶提供了技术可能，尤其是人工智能作为通用型技术，本应成为缩小全球发展差距的普惠性工具。但现实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：全球贫富分化达到二战后最高水平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22倍扩大至2023年的28倍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。

现有研究对这一悖论的解释分为两大脉络：新古典经济学将不平等归因于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本不足、技术吸收能力薄弱等内部因素，回避了全球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；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国际垄断、中心—外围理论揭示了不平等的制度本质，但大多停留在静态结构分析，未能以资本运动为核心，揭示不平等的动态累积机制。基于此，本文以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循环为核心主线，揭示全球不平等的动态生成逻辑，并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对这一逻辑的重构与放大效应。

二、全球不平等的核心根源：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循环与剩余价值转移

全球不平等的本质，并非技术差距带来的自然发展差异，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循环体系中，剩余价值跨国转移与中心国家集中实现的必然结果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提出的资本总公式($G-W \cdots P \cdots W'-G'$)，在全球化时代拓展为“中心国家预付垄断资本—全球生产要素配置—外围国家生产过

程—垄断定价商品—中心国家剩余价值实现与积累”的全球循环体系。

在这一循环体系中，分工、技术、制度、权力不再是静态的垄断支柱，而是嵌入资本循环全流程的四大动态机制：其一，分工机制是资本的全球空间配置机制，通过全球价值链层级切割，将外围国家锁定在低增殖的加工制造环节，为剩余价值生产奠定空间基础；其二，技术机制是资本增殖的强化机制，通过核心技术垄断扩大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差额，放大超额剩余价值规模；其三，制度机制是资本流通的保障机制，通过主导全球贸易、知识产权规则，保障垄断资本自由流动与剩余价值跨国回流；其四，权力机制是资本循环的强制保障机制，通过科技遏制、金融制裁等国家手段，阻断外围国家的追赶路径，维护垄断循环的稳定性。

四大机制的协同作用，形成了“剩余价值中心实现—垄断资本积累—壁垒强化—剩余价值转移规模扩大”的循环累积闭环，这一闭环不存在自发收敛的市场机制，最终导致全球不平等的持续固化。

三、人工智能时代的垄断重构与不平等放大效应

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并非加剧不平等的根源，但其被国际垄断资本掌控后，全面重构了资本循环的四大机制，成为垄断资本循环的加速器，使全球不平等进入了更强的自我强化路径。

在分工维度，人工智能重构了全球价值链的层级结构，垄断资本牢牢掌控大模型训

练、高端芯片、核心算法研发等核心环节，将数据标注、低端算力运维等低附加值环节向外围国家转移，形成了全新的“中心—外围”分工格局，价值链利润分配差距从传统的8:2扩大至95:5，剩余价值转移效率大幅提升。在技术维度，人工智能形成了“技术—数据—算力”三重垄断闭环，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门槛呈指数级上升，原本可通过技术扩散消解的生产率差距，转化为永久性的制度鸿沟。在制度与权力维度，美西方国家主导制定严苛的AI跨境数据规则、芯片出口管制规则，以算力封锁、实体清单为核心的智能霸权，替代了传统贸易制裁，成为维护垄断循环的新型强制工具。

四、中国的应对路径

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不平等，核心在于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的循环壁垒，构建自主可控、普惠包容的发展体系。其一，坚持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自立自强，突破高端芯片、核心算法等关键技术垄断，打破国际垄断的技术壁垒；其二，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

为载体，构建包容性的AI合作体系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、人才支持，搭建替代性的价值循环网络；其三，积极参与全球AI治理规则制定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；其四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发展，而非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，为全球不平等治理提供中国方案。

五、结论

全球不平等的本质，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循环体系中剩余价值跨国转移的必然结果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循环的垄断性与累积性。只有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的制度性壁垒，重构全球价值生产与分配体系，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普惠性力量，从根源上遏制全球不平等的持续扩大。

孟柯、张思睿、冯陆颖、杨桐、戴广民：人机共处的未来 ——智能体时代的个体赋能与社会协同

一、引言：AI技术飞速发展带来“人机共处”时代

在人类漫长的技术演进史中，每一次通用目的技术的突破，都会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度重构。当前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演进，正以前所未有的势能推动智能体从传统的“对话交互”向“自主执行”跨越，深刻重塑着人与智能体间的协作关系。

这一转变源于底层技术架构的实质性突破。以OpenAI o1、DeepSeek-R1等具备强推理能力的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基础模型，通过引入大规模强化学习与思维链技术，在

复杂逻辑推演和长上下文处理能力上跨越了关键门槛，使得它们的“大脑”足以支撑高度复杂的决策任务。与此同时，模型上下文协议与自动化框架（如 OpenClaw）的日益成熟，打破了系统间的壁垒，赋予了AI操作外部环境的“数字之手”。AI不再是被动响应人类指令的文本或图像生成器，而是演变为具备复杂任务拆解、跨系统API调用与自主执行能力的“全链路行动单元”。

正如上述内容所说，“人机共处”已经跨越了理论探讨阶段，转化为数字经济时代中现实存在的生存与生产范式。它正在以